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

李路路

[摘要] 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征的研究,需要从多维特征的描述转变为两个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从中间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矛盾位置解释多维特征的结构基础;第二,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定的功能特征。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和环境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随着环境变量的变化,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特定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环境因素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及社会功能特征的关系模式的构建,为人们加深对中间阶层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个以新的问题取向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中间阶层;多维特征;社会环境;多维社会功能

[作者简介]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和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社会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其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结构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和成长,也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革之一。

围绕中间阶层的定义、范围、数量、构成、社会性质、社会功能及社会影响,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这是中间阶层分析的核心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处在快速形成的过程中。因此,本文力图借助一些典

与本文所使用的“中间阶层”概念相类似的其他概念还有很多,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社会中间层等。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说,中间阶层还包括那些传统的自雇用户,如作为独立经营者个体的农民、小业主、个体户等,他们可称之为“老中间阶层”。“新”、“老”中间阶层的分析可参见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第2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本文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主要是指新中间阶层。同时,在中间阶层的分析中存在着“一元”和“多元”的分歧,即中间阶层内部的内质性和差异性的分歧。前者可参见John Goldthorpe.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Information and Future”. in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Chapter 6;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也有很多学者持后一种观点。基于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笔者把中间阶层看做是一个整体,暂且忽略其内部的差异性。

有关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分析和讨论,可参见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4);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李正东:《关于当前中产阶层研究的几个思考》,载《天府新论》,2004(1);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5(6)。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本文所谓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词,是指中间阶层的行为取向、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或者社会作用。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政治、文化、消费等层面,其特征和表现也各不相同。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型的国家(地区)个案,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变量入手,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框架。笔者充分了解这一问题在理论争论和现实状况中的复杂性,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和所建立的概念模型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到基本的变化模式,而不至于深陷纷繁复杂的现实或具体的争论之中而丧失了分析的基本线索。

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不是单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基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问题研究应转变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定的功能特征。

一、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彰显出多种多样而非单一性的特征。

一些研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阶层,因而它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最为典型的是米尔斯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其他许多学者虽然在具体论述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支持中间阶层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1][2]}在西方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结构变革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这种保守性特征和稳定性功能。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中间阶层彰显出与保守性或稳定性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特征,即它们成为激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最积极的政治变革力量来自中间阶层。人们对于中间阶层的这种激进取向一般给予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和意识形

态的解释。例如,中间阶层因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准,因而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追求私人领域和公民权利,具有更高的参与意识等。另一种可称之为“市场的解释”,即新兴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意味着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交易是基于独立的个人或集团的权利,因此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总是会积极推动基于自由的变革。^[3]

但上述两种解释都无法合理地说明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第三种社会功能特征,即“依附性”,以及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转换。“依附”是指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或群体而存在,但没有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而是依附于某一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特别是某种威权主义的政体。

不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存在上述三种特征,而且三种特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文化或者市场既定的情境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亨廷顿曾经指出,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就会变得保守。^{[4](P313-314)}

鉴于中间阶层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功能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就不应停留在单一维度上,而是应该转变为一种多维度的模式分析,即探讨在何种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呈现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本文的意义即在于此。

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业已存在。例如,米尔斯在其开创性著作《白领》中,讨论了中间阶层在政治方向上的四种可能性。^{[5](P326-327)}亨廷顿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从合法性、经济发展、宗教影响和外部势力等方面给予了解读,但他的分析仅集中于一种特定的政治运动,而不是对

这些个案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巴西、印度等。笔者认为它们对于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典型的国家(地区),尽管其他国家的情况与这些典型个案有所不同,但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有必要对中间阶层的“激进”特征做进一步分析。早期的研究者看到了工业化国家中间阶层与“新社会运动”的紧密联系,从而认为中间阶层的发展会表现出激进性特征。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激进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激进性或革命,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民权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等。而人们在新兴工业化社会中讨论的中间阶层的激进性特征,则涉及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本文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保守”或“激进”的概念。

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都可以看到中间阶层彰显出的激进特征。

正如人们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以及60年代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巴西所看到的情景,中间阶层依附于威权主义政权,甚至法西斯主义政权。

于一个特定阶层的分析。^[6]李友梅在对上海的白领群体进行分析后,提出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和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7]而赖静萍则从经济、阶层、社会结构、现实政治和国际因素等方面解读了新加坡中间阶层的特征。^[8]问题在于,他们的分析的模式化的程度较低,对各因素之间的联系缺乏解释。本文可以看做是这些努力的继续。

二、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其基本性质在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彰显。因此,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首先应该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开始。

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产生过程。(新)中间阶层因其在科层制组织中的管理职能和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中间阶层是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群体,其社会结构位置处于以大财产所有者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位置的概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界定,如收入(财产)、职业、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主观认同、社会关系等。但这种社会位置的核心是中间阶层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凸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从社会关系结构的视角出发,中间阶层的社会位置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和服务的高度社会化、组织化,以及专业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重要性,导致相应的社会结构位置从过去的两分结构中分化出来,在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无论是从阶层封闭的机制,还是从利益的对立性来看^{[9][10][11]},正是这种位置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区分出中间阶层的基础。第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之一是社会等级秩序。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是嵌在过去的两分等级结构中的,因而构成了它与上、下层关

系的多面性。在中间阶层的研究中,即使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也都特别强调中间阶层的这种中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面性特征。例如,赖特曾经以“矛盾阶级位置”的概念描述了它们的矛盾特征,戈德索普曾以自主性和依赖性描述了它们的两面性,普兰查斯则从“新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出发认定:中间阶层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之中。^{[12][13]}很多学者也指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间阶层特征的多样性。中间阶层的不同功能特征就根植于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中。

保守性。在一个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的权力、资源与机会,都是在一种等级结构中分配的。这种社会等级秩序之中的中间阶层位置,同样是随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分化而形成的。虽然中间阶层主要由受雇佣者组成,其上存在着一个控制、支配、剥削它们的上层阶层,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一定的组织管理或专业技能的需要,使得它们的雇佣状况,包括工作状况、权力(权威)、收入和社会声望等都优于其他的受雇佣者,中间阶层的特定利益也产生在这种等级秩序之中。因而这一位置的占据者往往维护等级秩序,具有保守性或稳定性特征。

激进性。尽管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但一个社会的等级结构在本质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建构的。因此,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上层阶层所建构的等级结构与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位置相“协调”,即虽然中间阶层受到上层阶层的支配、控制甚至剥削,但它们得到的“回报”是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它们的特定利益有独特保障且明显不同于社会下层。这时它们的保守特征就凸现出来。戈德索普曾经用“服务关系”和“服务阶级”的概念描述并预期了中间阶层的保守特征。^[14]二是上层阶层所建构的等级秩序损害或者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由于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分别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不同位置上,二者在利益上具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中间阶层也内在地具有疏离的取向。当上层阶层主导的秩

例如,萧新煌:《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10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何平立:《现实与神话:东亚中产阶级与政治转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序损害或威胁到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时,中间阶层疏离的取向就有可能转化为“反抗”的激进行动。“无产阶级化理论”、“新工人阶级理论”等都曾特别强调:这种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间阶层具有“激进”的潜在特质。^[15]

依附性。“中间阶层”位置的涵义之一,是在社会结构的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与之相对的下层阶层。因此,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不仅取决于和上层阶层的关系,而且还取决于和下层阶层的关系。社会等级秩序尽管是由占有优势的上层阶层主导的,但同时也是各个阶层相互斗争或妥协的结果,因而下层阶层对于等级秩序的建构也具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关系同样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联合,即相对于上层阶层来说,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同属下层,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当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上层阶层的威胁时,它们有可能和下层阶层联合起来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二是排斥,即当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社会下层的威胁或损害时,它们不仅会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而且为了保证它们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和利益,甚至有可能接受维持秩序的极端方式,暂时放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依附于社会上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很多中间阶层的分析,更多地关注了中间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关系,结果不仅忽略了中间阶层的依附性特征,而且将保守性和依附性混为一谈。

中间阶层功能特征的多维性质,不仅源于它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还来自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第一,当中间阶层力量比较弱小时,意味着社会结构中不存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其自身也不足以抵制可能来自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威胁,从而会更多地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第二,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其生存的社会空间和能力都随之扩大,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特征也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上述关于中间阶层的多维性质以及多维特征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有可能彰显出某一特定的功能特征。

三、社会环境变量

在本文看来,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并且随着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中间阶层所彰显的某一功能特征也会发生改变。

1. 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最基本的背景变量。经济发展过程对中间阶层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无论是对早发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说,经济—技术的发展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经济发展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以及更加多样和复杂的职业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更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例如,贝尔曾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系统地揭示了工业化社会职业结构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革命性意义^[16],古尔德纳则在同样的背景下讨论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级”的崛起。^[17]

其次,经济发展意味着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增长方式和机制的改变,使得原本一个两分的结构日益转变为“三极化”的结构。相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的处于下层位置的阶层来说,伴随经济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现代社会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阶层。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社会功能,正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中间阶层得益并依赖于经济发展过程。

再次,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迟缓或“中断”将会直接影响中间阶层的生存和利益。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阶层可能彰显出不同的功能特征。

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中间阶层所实际彰显的不同社会功能特征与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但是,再没有把经济因素和社

例如,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保守特征,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激进特征。

会—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更为简单的社会科学分析了。经济发展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特征,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结构背景下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现象,除了受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特征同样如此。

因此,经济变量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背景变量。但为了更有效地揭示中间阶层所彰显的不同社会功能特征,有必要引进第二个社会环境变量: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2 政体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各个国家政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为了集中表达本文的分析逻辑,笔者借用政治学家的概念,将纷繁复杂的政体形式理想化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别考虑两种政体的影响或意义。

“民主政体”是一种制度安排。^{[18](P395)}在“民主政体”下,权力结构及其等级秩序是通过公民及(利益)组织公开、合法、有序地竞争来建构的,因此,政体对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度度的响应性,即政体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制度安排相应发生变化。

在“民主政体”下,一个社会的经济从不发达走向较为发达、从较为发达走向高度发达,与之相应的中间阶层的发展与“民主政体”的权力结构较少发生根本性冲突,原因不仅在于中间阶层是在

这一政体下的权力结构及等级秩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于这种制度安排也是中间阶层发展壮大后维护和追求自己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基础。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下,虽然在中间阶层上面还存在一个上层阶层,但其相对独立性在相应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证的,其特定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可以将这种社会位置在代际之间延续下去。即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迟缓,其基本制度安排仍然会保持下来。因此,中间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其他一些概念,如“稳定器”、“缓冲层”等,都适用于描述这种政体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

在“威权政体”中,虽然权力结构存在有限的竞争,社会拥有一定的自由,但国家保持着对社会较高度度的影响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威权政体”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晚发”国家(地区)来说,这种政体甚至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和高速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中间阶层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伴随现代经济的增长,中间阶层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逐渐发育和成长起来。在这一阶段,我们会看到中间阶层在总体上对于“威权政体”的依附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其发育、成长都依赖并得益于这种政体主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在这一阶段,中间阶层的社会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但这种依附性将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例如,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中间阶层所表现出来的依附性特征,以及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不同国家(地区)中间阶层所彰显出来的共同特征(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73~74页)。

例如,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在民主制度背景下实现的,印度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经济发展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实现的,但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变化。

林茨曾系统讨论了“民主政体”、“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和“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三种基本的政体类型(参见Juna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175)。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众多的亚类型,如“软威权政体”、“后威权政体”等。本文借鉴亨廷顿的做法,用“威权政体”来指称所有和“民主政体”相对的政体形式。

亨廷顿讨论了经济发展阶段与民主化的关系。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地区),更有可能发生民主化的浪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人均GDP的水平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发生变革的国家(地区)中,人均GDP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从300美元左右到3000美元左右。第二,“威权政体”的可行性似乎更是其社会性质的函数,而不是其政权性质的函数(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73~74页)。但是,经济发展毕竟提供了变革的基础,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可能是无意义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所带来的变化更为重要。

“威权政体”和中间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意味着:第一,新的、更加多样化、复杂和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第二,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19](P4,75)};第三,中间阶层的规模急剧扩大。由此,尽管中间阶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附于“威权政体”,但其社会空间不断扩展,相对独立性和利益日益凸显。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导导致中间阶层与“威权政体”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威权政体”对于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越来越难以驾驭和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威权政体”就其本质来说,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威胁到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这时,“威权政体”自身的性质导致它有可能从中间阶层依附的对象转变为威胁的可能来源之一。中间阶层的“激进”的反体制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有可能显现。同时,如果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经济增长的迟缓甚至“中断”,其体制的合法性也将随之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在“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会导致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经历一个从依附到激进的转变过程。

3. 秩序(制度化)

可以将“秩序”理解为社会行动单位互动关系和行为的模式化,或者在共同价值和规范框架内的社会互动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秩序是以制度来标识的,即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越高,一个社会就表现得越有秩序。因此,制度化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过程。秩序的对立面是无政府状态。如果说秩序是和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和社会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秩序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等级秩序(包括分层秩序,或者阶级秩序、阶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正如前述已经指出的,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征和功能是建立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之上的。等级秩序是中间阶层地位的基础。本文在这里关注的是秩序或制度化的水平而不是秩序形成的过程。

之所以将“秩序”作为一个相对于政体的独立变量,是因为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虽然政体是影响秩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因素。从秩序的本质看,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机制在于制度化的过程,而秩序的维持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威权政体”还是在“民主政体”下,秩序和混乱都是可能存在的社会状态。

在社会有秩序的状态下,中间阶层有可能表现出保守或激进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和政体的性质,此点在前面已有所讨论。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威权政体”下中间阶层从依附转向激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等。但由中间阶层所主导的激进运动是一种低度混乱的运动,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征决定了它们不会进行一个彻底打破社会秩序的运动,而是希望构建一个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社会权力结构。因此,这种激进运动不是等级秩序的颠覆,而是政体的变革或权力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通常是一个伴随合作、妥协、低度暴力的

我们在韩国可以看到典型的转变。韩国在朴正熙通过政变建立威权政府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87.71 美元,城市化率为 28%。自 1962 年开始,韩国连续实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汉城奇迹”,1962—1966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8.3%,1966—1971 年达到 11.4%,1987 年经济增长率高达 13%。至 80 年代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工业化国家”。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80 亿美元,为 1962 年的 41 倍,居世界第 15 位,人均 GDP 达到 3360 美元,1980 年城市化水平达到 57.3%。80 年代初,韩国经济开始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式发展向“民间主导”的经济体制过渡。从 70 年代开始,反体制运动逐渐复苏,80 年代不断高涨,1987 年爆发著名的“和平大行进”,最终导致长达 32 年的“威权政体”解体(参见曹中屏、张琰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金都姬:《韩国解放 50 年政治简史及其意义》,载《当代韩国》,1995(5);黄俊尧、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的韩国政治变迁》,载《学术中国》,2004 年 7 月 7 日,http://www.gongfa.com/hanguoxianzheng.htm,2008 年 2 月 6 日)。

当然,并不是说在经济不发展的背景下,中间阶层就不会彰显某种“激进性”特征。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间阶层都有可能形成这种特征。这不仅是因为中间阶层内部包括了不同的组成部分,如知识分子群体会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因为其他制度条件的影响。我们在一些后发国家(地区)的经济起飞阶段,甚至经济起飞之前,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实例,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等。但是,作为一个阶层的普遍性特征,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限制了相对独立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这里的所谓“主导”,是指引领或领导,并非指中间阶层是激进运动的全部力量。

过程。^{[20](P233)}

社会无秩序则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经济增长过程。从统治的角度来说,无秩序意味着国家统治的衰落;从经济的角度看,相互依赖的现代经济不可能在混乱的状态中维持增长;从社会的角度看,无秩序意味着整个社会缺乏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和权威的行为规范。当社会冲突发生时,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没有认同,也没有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权威人物作为仲裁人。“混乱”是对任何秩序(包括等级秩序)的破坏。

当无秩序状态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经济发展,而中间阶层又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的特征:中间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表现出强烈的恢复秩序的倾向,甚至不惜依附于极端的威权主义,以期借助于威权主义国家恢复社会秩序,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自身的发展。这种依附不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前期的那种依附性成长,而是一种由无秩序的或低度制度化的秩序(即使是民主制度)转向有秩序的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相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反动”。

四、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模式

以上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出发,分别讨论了三个社会环境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影响,以及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特征彰显的模式。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1) 中间阶层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蕴涵着社会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

(2) 经济发展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变量,没有现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没有所谓(新)中间阶层的问题,现代经济发展造就了中间阶层。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体性质和社会的秩序化程度。

(3) 在“民主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该政体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中间阶层因而彰显出保守的社会功能特征。

(4) 在“威权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其社会功能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前期,中间阶层会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发展本身和中间阶层的扩大导致与“威权政体”发生冲突,中间阶层会由“依附”转向“激进”,即试图改变“威权政体”。

(5) 中间阶层的本质在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中间位置。因此,“秩序”特别是等级秩序对于中间阶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秩序遭到了威胁或破坏,特别是当社会无秩序严重影响到中间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以及经济发展时,即使是在民主政体下,中间阶层恢复秩序、维护利益的强烈取向也将导致它们依附于“威权政体”。

总之,中间阶层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

“民主政体”涉及两个基本维度:竞争和参与。而“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稳定性和重要性的过程”。如果竞争和参与与制度化之间是反比关系的话,则结果是政治不稳定或无秩序(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4、60页)。

巴西是中间阶层这种特征彰显的一个典型。1945—1964年,巴西经历了长达20年的民主化时期。1950—1964年,巴西进入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变革时期,1957—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增长值几乎是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3倍。但是,这种民主化的过程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情、社会结构和历史,形成了一种带有特殊色彩的拉丁美洲“民众主义”(Populism),即: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急剧增加,在不同利益的竞争和斗争中,各个政党为了获胜,直接动员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导致大规模的工人农民运动,并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政治制度和有权威的合法政治领袖作为仲裁人。1963年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且各种社会运动的激进倾向不断增长时,整个社会和国家陷入高度的动荡且无序的状态中。当这种无秩序的参与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间阶层生存的基本秩序,特别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威胁日益明显时,中间阶层保持或重建秩序的愿望成为主导的行为取向,支持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威权政府,实行高压统治以重建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巴西经济奇迹”。1969—1973年,巴西GNP年均增长11.2%,1973年更是达到13%。(参见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能特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其社会功能特征会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意义是不同的。

五、进一步的影响变量

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上述模式仅是在“理想类型”意义上建构起来的。这个模式涉及的三个基本变量,能够构成中间阶层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空间,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由此可以得到基本确认,也就是说,它们给出了因这些社会环境变量的变化导致不同中间阶层功能彰显的逻辑,构成了分析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基本模式。

但是,这个基本模式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三个基本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难以精确化。例如,“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或者秩序化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中间阶层的影响等,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无法给出精确的界定。应该说,这既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甚至也许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思维能力,本文只能给出一个基本框架。第二,即使是在上述基本模式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也常常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例如,在政体性质和秩序化制度基本相同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中间阶层彰显出类似的社会功能特征。这意味着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还有可能受其他变量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直接的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是必要的。在作者看来,以下三个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具有进一步的重要影响。

(1) 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

包括观念、理想、信念、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观等,它是一种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是一种观察事物和世界的方法。这其中也包括了曼海姆所说的“特定的”和“总体的”两种基本类型^{[21](P73-85)},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不仅仅是某种具有政治倾向和选择、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思想体系。

在上述基本模式框架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更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即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社会成员对生存状况、社会环境、未来趋势乃至利益诉求等,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解释性框架,不仅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文化传统等都会影响到这种解释性框架的形成,从而影响到中间阶层的行为取向。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涉及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社会目标,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社会目标,一种在某一政治意识形态下可以接受的秩序在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下就变得不能接受。而长期形成或沉淀下来的社会观念和道德理念,构成了人们行动的深层结构,影响到人们的选择和判断,引领人们的行为。

(2) 国际环境。该因素主要是从外部影响的角度考虑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强调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结果。其实,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西欧开始起步以来,整个世界就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全球体系。所谓国际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其作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方式从一般的传播到直接的干预等,都会作为重要因素进入到该社会中,并对该社会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国际环境可以加速或阻碍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方

例如,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的经验来看,既不能给定经济发展或人均GDP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这些国家(地区)中会出现中间阶层的民主化运动(只能给出一个充满弹性的空间,可见前面关于经济发展因素的讨论),这些国家(地区)的中间阶层民主化运动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或早或晚多次发生的。其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熊彼特所谓“古典民主理论”(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370页),民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韩国、巴西和中国台湾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西在20世纪中期由“民主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转变,同拉丁美洲独特的“民众主义”民主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再如,在韩国、巴西等国家的转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的重要影响,韩国在反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前,全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由城市青年、市民和中产阶级构成,金友煥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1987年改宪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参见黄俊尧、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还有研究者指出,韩国现代历史上威权主义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除了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都是有利于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参见黄俊尧、金基福:《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

向:当一个社会达到了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时,国际环境有可能推动中间阶层的转变;反之,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国际环境有可能导致中间阶层作出某种努力。^{[22](P97-112)}有时,国际环境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到一个社会并为中间阶层的某一部分所接受,会直接影响到该部分成员的行为;外部直接的政治或经济干预也会导致一个社会内部的变化。即使国际环境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仅仅是示范效应,也会成为中间阶层功能转变的诱导因素。

(3) 中间阶层同质性。这一变量涉及中间阶层自身的特征。在上述分析模型中,我们预先设定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但与上层阶层和下层阶层相比较,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以及相应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变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矛盾性质以及多样化的来源和构成,都使得它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研究者们强调中间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特征,正是对这种异质性特征的反应。

上述三个进一步的影响变量,只是在“理想类型”中得到了讨论。当我们越接近一个具体的社会或过程时,就越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影响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越复杂。

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上述分析是借助于几个典型国家(地区)个案,以“理想类型”的方法,建构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模式。笔者想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将分析

的目光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将上述“理想类型”模式运用于分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的具体研究时,必须考虑到相对更为特定的影响因素,遭遇“复杂性”的挑战。由于受本文分析目标所限,在这里无法对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社会功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作者只能从前面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出发,遵循同样的分析逻辑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正在经历渐进式制度转型的社会,即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如果说现代化转型具有更为普遍的特征的话,渐进式的制度转型则会带来更为特殊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1) 制度结构。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构成了转型社会的起点。在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上,中国社会结构的下述特点对于分析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通过“再分配体制”将这些资源和机会分配到每一个个人或群体。第二,与之相应的城镇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形式是“单位体制”,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组织到一个个“单位”之中,“单位”构成了中国城镇社会基本的组织制度。^{[23][24][25][26]}第三,制度化的身份“隔离”和行政化的普遍化,几乎覆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总体性社会”。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

例如,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中间阶层转向依附“威权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古巴革命以及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中间阶层对于在古巴所发生的“底层”革命的恐惧,以及对于秩序的担忧,成为它们倒向“威权政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70年代到80年代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反威权主义的运动,除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也与美国和欧共体,特别是美国政府全球战略的转变有关(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97~112页)。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巴西等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某种激进的特征,这种表现无法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来解释,而更多地是受到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例如,中间阶层的社会来源:不同的社会来源会将其自身特征带入中间阶层,而社会来源的模式又受到工业化过程和社会转型过程的影响;再如,形成过程的差异:渐进形成和高速增长形成的过程会导致在前一过程中形成的中间阶层带有更多的同质性,而在后一过程中形成的中间阶层可能带有更多的异质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用上述理想类型模式分析中间阶层社会功能时,存在着一个不应忽视的个案,即新加坡。新加坡在“威权政体”下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间阶层正在崛起,但在新加坡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激进中间阶层运动,从而成为在上述模式之外的一个特例。有研究从新加坡社会的一些特殊因素角度上解释了这种状况,例如,自然地理、种族、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现代政治发展和国际环境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参见赖静萍:《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本文作者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解释,还需要留待后续的研究。

例如,干部、“城里人”和农民的隔离,“政企合一”、“政社合一”的制度等。

类似于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即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制度结构下,他们生存的社会结构空间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

(2) 转型过程。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国家推动和主导的,采取改良方式分阶段、分领域逐步推进,并且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因而表现出相对更强的对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特征。尽管大量新的结构要素和关系已经进入社会结构的体系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改变,但原有的体制要素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3) 现代化过程。伴随改革开放的,是中国社会迅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当代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维持了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随着体制改革和高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和成长。因此,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一方面催生了中间阶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间阶层异质性的增强。

原有制度结构和转型过程的特殊性以及迅速

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对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来源及构成、形成、行为取向和社会功能都将产生直接影响,构成了分析中国中间阶层的基础。转型社会特别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势必会提供中间阶层分析的新的环境性变量。

以上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实际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理想类型模式,然后以此为基础逐渐向丰富复杂的现实层面推进。现实社会是如此的丰富、复杂,中国社会是如此的丰富、复杂,以至于任何理论模式都不可能概括全部的现实,都只是从某一角度对现实作一定程度的抽象。中间阶层的分析也是如此。本文所做的努力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就达到了作者的目的。正如前述所指出的,有关中间阶层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功能特征,在国内外的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讨论,因此,如果我们转向关注转型期中国的中间阶层时,分析的重点应该是更多地关注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结构及其转型过程中,中国中间阶层的性质(社会结构位置等)具有哪些特殊性,哪些社会环境变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彰显。

参考文献

- [1][14] John Goldthorpe.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Information and Future" in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2][16]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1977。
- [3] 詹姆斯·布坎南:《经济自由与联邦主义》,载刘军宁、王焱、贺卫方主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 [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5] 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6][19][20][22]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7]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5(6)。
- [8] 赖静萍:《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 [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例如,周晓虹、李强等关于“类中产阶级”的分析和关于中产阶级的分类(参见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5页,《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载《社会》,2005(5);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载《战略与管理》,1999(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3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李春玲及张宛丽、李炜、高鸽对中间阶层构成的分析(参见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第9章;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构成特征研究》)等,以及笔者本人的分析(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7(6))。

- [10] Frank Parkin. "Strategies of Social Closure in Class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1974.
- [11][12][15] Erik O. Wright. "The Biography of a Concept: 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 in John Holmwood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Volume ,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85.
- [13] 尼克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6。转引自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7] 艾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18]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1]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23] Ivan Szele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8, 19(1 - 2):63 - 87.
- [24]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1)。
- [25] 李路路、王奋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26]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3(5)。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 New Question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

L I L u-lu

(Research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The study of the social-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eds to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to two mo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questions: the first is to explain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inconsistent posi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the second, in what condi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the middle class shows the special functional character. The article founded a relation model including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lik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extent, explain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at the middle class shows different social-political func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inted out the logic rela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vided an analysis frame based on the new question approach.

Key words : middle class;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social environment;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武京闽)